

中國模式的解讀與反思

近期香港對國民教育科的爭議不絕。風波的導火綫是由政府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本文集中評析「中國模式」的概念及所面對挑戰。

三十年來內地經濟快速發展，取得近平均百分之九的增長，到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通過各種硬實力來提升其國際聲望與影響力。

在一九八九年美國學者Jan William提出「華盛頓共識」，以代表美國為首的南美國家所倡議的競選式民主價值與自由市場經濟。隨着中國崛起，亦有西方學者(J.A. Coper Ramo, 2004)提出「北京共識」，贊同民主集權下的混合所有制，認為中國有必要限制企業私有化、金融業及國際貿易自由化，在維持社會穩定大原則下鼓勵大膽創新改革。

○八年美國次按引起的環球金融危機令全球金融系統陷於水深火熱，不少歐洲國家面臨嚴重經濟問題，一向備受推崇的美式金融制度備受指責，「華盛頓共識」進一步受到挑戰。

相反地，中國在金融危機發現後立即採用果斷宏觀經濟措施，產值仍可保持高增長，民生受到的影響亦相對較少，並積極參與世界金融基建架構的

重組工作。這令「北京共識」更為受捧，逐漸形成所謂「中國模式」。

對成敗關鍵因素理解不一

「中國模式」一詞，一般用以籠統總結過去十多年快速穩定的經濟發展經驗，但這個「中國模式」叫法，在學界與國際政經界有一定的爭議。

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一書內，內地作者形容「中國模式」為一巨大而輝煌的古代動物——「鯤鵬」大鳥，巨鳥的頭為民主集中制、身為國家體制及翅膀為市場經濟，與一飛沖天的神話一脈相承。

根據前英國外交家Leo Horn-Phathanthai的看法，「模式」一詞是指相對較固定及已成形的獨特制度架構，並至少包括三個元素：成功、可重複及故意設計，但這三方面「中國模式」都有爭議的空間。

內地對《中國模式》的理解，也包括「國情不同」的含義，也就是所謂「中國例外主義」，即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由於其獨特體制所致，西方的模式或理論並不適用。但究竟有何不同則很少有解釋。

不同人對「中國模式」的成敗關鍵因素也有不同的理解。有學者描繪「中國模式」為經濟自由及政治

威權主義並行(即所謂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國家對土地、能源、金融與重大行業作壟斷控制。也有些專家認為中國計畫經濟相對成功的主要因素，為龐大基建投資、對外資本開放、出口導向、物價自由化、勞動力自由化、和具傾斜性的工業政策，但似乎更多的共識就是「政府主導、實用主義、大膽試驗、循序漸進」的政策。

社會問題多 被指不合時宜

西方一些國家擔心發展中國家欲追隨或模仿這個所謂「中國模式」。這種叫法也令部分中國官員和學者感到不安。

事實上，國家領導人盡量避免公開使用這個名詞。中國官員較喜歡用「中國故事」或「中國經驗」等較中性的詞彙，以說明自己已找到獨特的現代化方法，也有內地學者認為用「中國模式」這個名詞，容易導致人民自滿而拖慢進一步改革。他們擔心鼓吹「中國模式」者，不能引導人民看清形勢和風險所在，尋求突破，反而沉迷於肯定現狀，美化和遮掩缺陷不足。

另外，也有一些專家認為「中國模式」未談得上成功及未真實存在，因此也無法輸出或作模仿。急

速經濟發展和相對政治穩定也不是沒有社會代價。

中國社會處於轉型階級，雖然國已較富強，但有待急須改革或解決的其他問題成堆，包括如人權與公民權利欠保障、法治成疑、司法欠獨立、通訊欠自由、貪污腐敗、道德衰敗、環境惡化、城鄉差距、貧富懸殊及政改滯後等等，很多這些問題也愈來愈嚴重。

一連串社會事件更是諱莫如深，例如溫州動車事故與四川什邡暴動事件，官方都把死傷數字隱瞞。面對這樣的境況與社會暴亂隱憂，有人認為稱之為「中國模式」，似乎是不合時宜。

另一令人憂慮的是，《中國模式》的學理立論，忽略了中國的歷史背景和現有問題，沒有把民族、國家、政府、政黨與公民社會等概念分開。如果用如此「中國模式」去教導學生中國國情，值得令人擔憂。

「中國模式」的其中一個意義，就是在其可重複性或可作輸出。現在很多落後或獨裁國家城市皆以中國體制為學習對象。「中國模式」本身的概念並不清晰，很容易變成政權用來解釋和合理化一些不民主的行為。

總結而言，所謂「中國模式」並未成熟及具有眾多缺憾。但正如前述，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成敗經驗及所衍創生的問題，沒有一個是可以複製的典範，其他國家不宜跟從，但也可作為借鑑參考。

何順文 資深大學工作者